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瞿启明/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北京:
中华书局,2013.5

(复旦文史讲堂;5)

ISBN 978-7-101-09189-2

I. 瞿… II. ①复…②中…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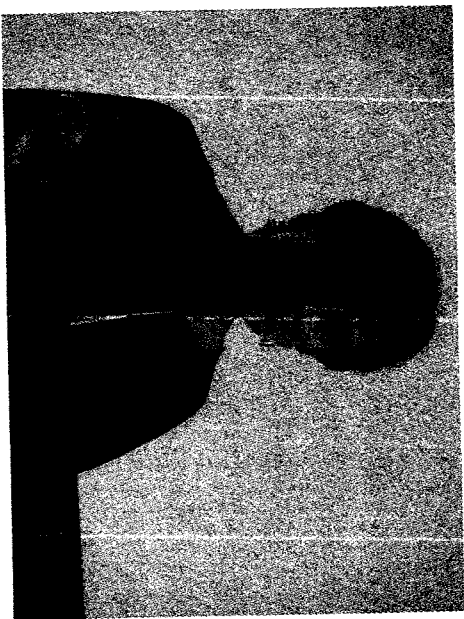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24163号

瞿启明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 编 复旦文史讲堂之五
中华书局编辑部

| | |
|------|---|
| 书名 | 瞿启明 |
| 编者 |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中华书局编辑部 |
| 丛书名 | 复旦文史讲堂(第五辑) |
| 责任编辑 | 胡珂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次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次 | 2013年5月北京第1版 |
| 规格 | 201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1000毫米 1/16 印张17 插页2 字数243千字 |
| 印数 | 1-2000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7-101-09189-2 |
| 定价 | 45.00元 |





戴卡琳 (Carine Defoort)

戴卡琳，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教授，主要研究先秦诸子和当代人对他们的解释。著有《解读〈鹖冠子〉：从论辩学的角度》，编有《墨家的血液在儒家的筋肉里：〈唐虞之道〉的“中道观”》、《〈墨子·兼爱〉上、中、下篇是关于兼爱的吗？》、《究竟有无“中国哲学”？》等，主编《当代中国思想》(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A Journal of Translations)。

章清：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了比利时鲁汶大学戴卡琳教授来为我们发表演讲。关于戴卡琳教授本人的情况，我们在演讲的告示上已经给大家做了介绍。她从事的研究主要是先秦诸子以及当代对诸子的解释，她的一些著作也已经被译为中文在国内出版，尤其是那篇《究竟有没有中国哲学？》在海内外都激起了热烈的讨论，葛院长还专门有一篇回应的文章，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些情况我们都已经有所了解。今天的主题是当代西方人对“正名”的解释。前两个礼拜我们见面时候，戴卡琳教授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现在她在文史研究院访问，研究的就是这个题目。就“正名”本身来说，在中国思想内部，这个问题被提出以后，历朝历代都有特别的解释。在近代中国，像胡适、冯友兰这些著名的哲学史专家，也赋予了这个题目许多新意。胡适也好，冯友兰也好，他们都是先在西方受到一些训练，再回过头来看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正名，我想这是研究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都绕不开的话题。我们的兴趣在于，当代的西方人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而为什么又会把这个问题聚焦到胡适那里。下面欢迎戴卡琳教授为我们作报告。

戴卡琳：

谢谢章清教授。首先我想感谢葛兆光教授，给我这个机会在这里演讲，而且他也给我机会在这边做一个月的研究，非常感谢。

在这个演讲之前，我想简单地介绍一下自己的研究。我的研究本来是先秦哲学，博士论文是关于《鹖冠子》，所研究的都是与先秦诸子百家有关的题目，而且不能按照学派来分，比如研究的题目有“弑”、“禅让”，以及最近研究的“利”，等等。我们在鲁汶大学也申请到一个课题，是关于墨子的研究，特别注意的是三点：一是墨子书里特别是“十论”有没有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比如《兼爱》的上篇、中篇、下篇之间是什么关系，有没有思想的发展等等；二是《墨子》在汉代有什么影响，虽然墨家已经不存在，可是墨子的影响我认为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比如汉代常常有“孔墨”这个说法，不但是孔子，墨子好像也被看做是圣人；三是看20世纪的学者对墨子的解释对我们当代人的影响有多大，包括胡适、冯友兰、梁启超等等。

差不多十年前，我就开始对另外一个题目感兴趣，当然也和我的研究领域有关系，就是当代的中国学者怎么解释古代的诸子百家。我最早做的就是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这个问题。我看了葛兆光的书，他到比利时的时候也常常和他讨论，对这个题目越来越感兴趣，这属于20世纪的思想史。我在葛老师的书里看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学者傅斯年，他对中国哲学的看法有点特别。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问题到傅斯年，我有一两年在研究傅斯年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看过他的一些书、信、文章等等。最近从傅斯年走到胡适，这是我的思路。

我对胡适的了解不多。今天这个题目既属于第二个领域，也与第一个领域有关。近代的学者怎么解释古代的一些观念？胡适怎么解释《论语》里的“正名”这个概念？他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不仅仅是对外国的学者，对中国的学者也是，对我的影响也非常大。

今天谈的题目是我们研究中的一个小部分。

《论语》中有一段著名的话，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我们西方人叫它“《论

语》13.3”：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段话。这里我不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考察孔子或者其他古代哲学家关于“正名”的思想，我的目的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怎么解释这段话，以及我们的解释是从哪里来。

这个报告分四个部分，第一，我们来看现在的西方学者一般怎么解释这段话；第二，看胡适怎么解释这段话，特别是他的博士论文，因为他的博士论文是用英文写的，对西方人的影响特别大；第三，汉代以前怎么解释这段话；第四，汉代以来怎么解释这段话。当然，后面两个部分也许并不能分得特别清楚。

1. 西方学者的解释

通过观察四十年来西方一些比较有影响的有关中国思想的著作，比如丘旦(Donald. J. Munro)的 *The Concept of Man in Early China*，以及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的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等等，在“正名”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发现，尽管他们各自的解释并不完全一样，但是他们的共同点是非常明显的：

第一，他们都认为，“正名”是孔子的重要观念。这些西方学者在论述中国古代思想的时候，至少总有5到10页的篇幅是关于孔子的，而不管涉及孔子的部分是长是短，作者都会讲到“正名”，有时候他们还直接地说，正名是孔子的重要观念。

第二，他们都同意，“正名”与社会的政治秩序有关。比如，作为王的人应

该有王的态度,作为父亲的应该扮演好父亲的角色,等等。

第三,为了解释这段话,他们都会引用《论语》中的其他三段话:“觚不觚,觚哉!觚哉!”(《雍也》);“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大部分西方人解释孔子与子路的这段对话时都会提到这三句话。

第四,他们都认为,孔子的正名观念是中国思想中语言观的基础,中国古代关于语言逻辑的思想都是从正名出发的。

除了以上四个共同点,许多西方学者还会提到正名观念的一些发展,比如说《春秋》里面褒贬的使用,他们都以“弑”为例,所以我之所以做过关于“弑”的研究,走的也是这条路;第二个,他们也常常提到《荀子》、《韩非子》、《申子》、《尸子》等书的政治思想;第三,他们还会提到《荀子》、《管子》、《墨经》、《尹文子》等书中的语言哲学。

这是我的第一部分,简单地介绍一下西方人怎么解释正名。那么,这些解释都是从哪里来的呢?

2. 胡适的解释

现在,我们看一下胡适关于正名的解释,尤其是他的博士论文。1917年,胡适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 Method in Ancient China* (《先秦名学史》)。回国以后,胡适在北大当老师,用中文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内容比较丰富,不过大致的意思差不多一样。所以我就以他的博士论文作为分析的对象。

我们来看一下胡适的解释和西方人的解释有哪些共同点。在有关孔子的部分,胡适首先介绍了孔子所在的时代,然后解释《易经》,因为他认为《易经》非常重要,而且可以代表孔子或者儒家的思想。随后,胡适在开始讲《论语》的时候,马上就讲到“正名”,他认为,“正名”是中国古代特别重要的思想,西方人也许不容易理解,但它确实是中国思想中有特色的部分。在引述了“必也正名”那段话后,胡适首先指出,“正名”和社会政治秩序有着密切

的关系。

胡适认为,“必也正名”这段话并不好懂,因此有必要参看论语中其他的相关论述。而他为了解释孔子和子路的对话,举出的就是“觚不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政者正也”这三句话。

在胡适的论述中,无论是《易经》的“辞”,《春秋》的褒贬,还是《墨经》的语言哲学,乃至《荀子》、《尹文子》、《管子》等书的逻辑思想,都与孔子的“正名”有关。事实上,《先秦名学史》全书的所有部分都是和“正名”有关系的,其他的思想都被看做是“正名”的发展。胡适常用的“正名主义”也许是他发明的词。

很显然,胡适的解释和西方学者的解释很相似,都包含上述四个要素。为什么?从哲学的角度,我们或许可以说,这些解释是最恰当、最合理的说明,所以大家只要理性地去思考,都会产生这些想法,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是不是后来的学者都受了胡适的影响?在胡适之前,关于“正名”的解释又是怎样的?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如今大家都认可的这些解释?

3. 汉代以前的解释

什么时候开始有人说“正名”是孔子很重要的思想?

第一,关于“正名”的重要性,在《论语》13.3节这段话里面,孔子自己认为“正名”是很重要的。当然有人说这句话是后来伪造的,不过这些问题我们现在不讲。可是,除了《子路》篇的这段话,孔子没有在任何别的地方提到“正名”,或者“名不正”、“正其名”之类,《论语》里面只有一次出现过这种说法。所以我想,很可能那时“正名”还不是一种固定的概念,当然更不是一种理论。其他的诸子偶尔也会提到“正名”、“正其名”、“名正”、“名不正”等说法,但是都没有提到孔子。《孟子》从来没有提到“正名”,《荀子》里面虽然有《正名》篇,但没有提到孔子,更没有提到“必也正名”这段话,看来他们对“正名”的看法也不一定与这段话有关。

第二,正名是不是跟社会政治秩序有关系?回到那句话,我想我们必须同意,孔子说的都是和社会政治秩序有关系的内容,大概没有人会否认这

点,因为孔子说这段话本身就是回答“为政”的提问。可是,语言怎么会是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呢?我们对语言的控制,怎么就能让我们这个社会更好一点?至少这段话没有说很清楚。如果孔子能讲到“行为”,或者“以名正行”之类的话,可能会好理解一些。梁启超、郭沫若包括胡适,都承认这段话不太好理解。当然有很多人后来解释,语言和行为有什么关系,但是孔子本人并没有明确说出来。

第三,把这段话跟上面我们提到的《论语》的其他三段话连在一起,孔子本人没有,也没有任何一位汉代以前的诸子用另外三句话来解释“正名”。不仅如此,汉代以前也没有一个人把《春秋》的褒贬跟“正名”联系在一起。

最后,在汉代以前,人们对“正名”这个概念的含义还没有达成固定的理解。以《管子》为例,这部书有五篇提到了“正名”或“正其名”(当然《管子》也不完全是汉代之前的作品):

《君臣下》:四正不正,五官不官,曰乱。是故国君聘妻于异姓,设为姪娣、命妇、官女,尽有法制,所以治其内也。明男女之别,昭嫌疑之节,所以防其奸也。是以中外不通,谗慝不生,妇言不及官中之事,而诸臣子弟无官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德困奸,昭公威私也……故曰,有官中之乱,有兄弟之乱,有大臣之乱,有中民之乱,有小人之乱,五者一作,则为人上者危矣。官中乱曰妒纷,兄弟乱曰党偏,大臣乱曰称述,中民乱曰奢悖,小民乱曰财匮。财匮生薄,奢悖生慢,称述、党偏、妒纷、生变;故正名稽疑,刑杀前近,则内定矣。

《接度》: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谓事名二?”对曰:“天筴,阳也。壤筴,阴也,此谓事名二。”曰:“何谓正名五?”对曰:“权也、衡也、规也、矩也、准也,此谓正名五。”

《心术上》:姑形以形,以形务名,督言正名,故曰圣人。

《白心》:天行其所行,而万物被其利。圣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是故万物均而众安。是以圣人之治也,静身以待之,物至而名

自治之。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废。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

《正》:守慎正名,伪诈自止。

在这些地方,都没有提到孔子,所用的“正名”意思也都不一样,有的和经济有关,有的和刑罚有关,有的则和五行有关,只有后面三篇里面提到的正名有些相似。当然可能是《管子》成于众手的原因,但也说明当时对“正名”的使用还是比较随意的,还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

汉代以后对于“正名”的解释可以分成三类,一是从这段对话发生时的具体历史情境去解释,二是用关于社会和政治秩序的理念去解释,有时候跟《春秋》中褒贬的使用有关系,三是把它解释成一种语言观,这是最抽象的一种解释。

第一,关于具体历史的解释,最早用卫国的政治来解释“正名”是司马迁。《史记·礼书》说:

周衰,礼废乐坏……孔子曰“必也正名”,于卫所居不合。

《史记·孔子世家》先提到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然后记载道:

孔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是时,卫君辄父不得立,在外,诸侯数以为让。而孔子弟子多仕于卫,卫君欲得孔子为政。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

司马迁提到的是卫国的具体政治。大家都知道,卫国在位的国君不是父亲而是儿子,而且还不让父亲回来。孔子有几个弟子在卫国当官,这段话是孔子对卫国政治的一种批评。

第二,与社会政治有关的解释,可以举出《春秋穀梁传》作为例子:“梁丘,郑作其师,我无加损焉,正名而已矣。”《左传》和《公羊传》则没有提到正名。

《春秋繁露》则侧重语言方面的内涵,《深察名号》篇在解释《春秋》中关于“六鹄退飞过宋都”和“陨石于宋五”的记载时说:

《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陨石,则后其正,言退鹄,则先其六。圣人之谨于正名如此,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五石六鹄之辞是也。

董仲舒的这段解释显然是本于《论语》的13.3节。

此外,《春秋繁露》的《实性》篇也经常提到“正名”,还提到孔子的话,而且还把正名和《春秋》的褒贬连到一起。《春秋繁露》在名实关系、名物关系上有很多的论述,比如“名号之正,取之天地;天地为名号之大义也”等等。我不知道这两篇是什么时候写的,现在有人说是魏晋时候的作品,这个我不敢肯定。

最后,我们做一个小结。第一,现代西方学者解释“正名”的四个共同点最早出现的时间都不早于汉代;第二,首先指出孔子“正名”历史语境的是司马迁;第三,把“正名”和“觚不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政者正也”联系起来的做法可能始于胡适,我还没有发现在胡适之前有人这样解释;第四,在胡适之前,很多人都用卫国政治来解释“正名”,包括朱熹,但是胡适没有这样做,而是采取了语言哲学的进路,这种解释模式给西方学者对孔子乃至整个中国思想的理解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了从哲学上更好地为“正名”做出解释,历史的考察也许会有帮助。

章清:

谢谢戴卡琳教授围绕“正名”问题为我们做的报告。听下来,大体上我们可以了解她在当下的研究中思考的几个面向。她的出发点是当代西方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然后对这个问题进行追踪。当然,问题并没有了结,胡适的这些看法是从哪里来的?所以她追溯到差不多孔子同一时代的人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然后是汉代以后的不同看法。我想这样一种追踪问题的思路的确可以引发我们对这类问题的思考,对于生活在当代的人,这都是无法绕开的问题。我记得陈寅恪在讨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就谈到过这类问题。他甚至认为,我们今天把问题梳理得越有条理,离古人之真相就越远。生活在今天的人,在做研究的时候如何更好地把握古代人的思想?戴卡琳教授的思路我很同意,那就是在面对古代思想的时候,首先要对有关这种思想的解释作一个历史的追踪,这是把握问题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当然这里面问题还有很多,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

提问与回答

章清:

我自己也有一些想法。第一,为什么我们去追踪“正名”,而没有考虑“名”的问题?孔子说过,“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从历史学的脉络来说,《春秋》追求的是名分的真,而不是历史的真,它往往偏重名的成分,而不是真实的成分。第二,近代也有不少学者把中国经典翻成西文,比如理雅各(James Legge)、辜鸿铭等等,在翻译的过程中有没有产生一些理解上的问题?

戴卡琳:

为什么选“正名”不选“名”?第一,大家都在讲“名”,研究“名”的话会比较复杂,而且也已经有人做过;第二,我对正名的怀疑比较大,我想本来它根本不是一个概念,更不是一种理论。胡适在他的书里常说“正名主义”,后面也有不少人说正名主义,我想这是从胡适那里来的。冯友兰看过胡适的书,很可能也受到胡适的影响,他对正名的解释更多地受到西方的影响,他对褒贬的使用频率的也不多,他也提到正名主义。明雅各个部用的是朱熹的解释。

葛兆光：

第一个意见，我比较同意戴卡琳教授从所有的文本里去清理正名复杂而丰富的内容，这些内容可能要到了汉代才形成，不过依我看，是汉代人的解释把它里面包含的潜在的意义发掘出来了。在中国的经学传统中，五经是一个整体，特别是《春秋》在汉代的影响特别大，《春秋》对正名的辅助性解释作用非常大。在汉代，五经是互相支持的，不是互相隔离的，从东汉的许慎、郑玄到更晚的王肃，都是以经解经。《春秋》为了褒贬，对人的行为都用了特定的词，也就是“名”，来解释，所以我相信，在汉代，胡适的解释所蕴含的丰富的含义都已经有了。但是我认为，千万不要相信，没有文献的支持就认为汉代以前就没有，也有可能已经有了，只不过没有表达出来。

第二个意见，你这个题目是胡适的解释对西方的影响，我想反过来问，西方人的哲学和语言学对胡适的影响有多大？胡适没有用历史的解释，而用语言哲学的方式来解释，我相信是受了西方的影响。在中国古代的语言的使用方面，语言是对社会和政治的调节，不是抽象的符号式的语言。所以应当注意到，胡适是受西方观念的影响，然后在中国资源中找到正名的。除了靠清教授提到的冯友兰之外，胡适的想法恐怕是受日本人的影响。在胡适之前，日本人已经出了四种完整的《中国哲学史》，或者叫《支那哲学史》。胡适的说法一方面是在美国接受了西方资源的影响，一方面可能受了日本人的影响，因为梁启超等人已经翻译了很多日本人的著作。我还想问，胡适的英文版博士论文在西方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第三个问题，汉代以前，关于名，或者说关于正名，其实是有三种不同的分支的。一种是孔子和儒家所代表的正名，跟社会政治有很大关系；第二是形名，大家都看过谭戒甫的《形名发微》，讲的都是公孙龙等人所说的那种纯粹的“名”，也就是语言符号；第三种更重要的，是刑名，尤其是《管子》里面多次提到。我觉得，可能这三种不同的对于名的使用是混在一起的，所以到汉代以后解释的时候，会把这很多意义都解释出来。

你讲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提醒我们要做先秦研究，同时也要懂得近代

学术，否则的话不太能够了解对于先秦学术思想的解释是怎么来的。同样，研究近代的学者恐怕也要懂点古代的东西，比如如果我们不懂得王国维所研究的东西，那么研究王国维只能研究他怎么投湖自杀，而不能研究他的甲骨文、金文、蒙元史和西北地理。谢谢。

戴卡琳：

我从最简单的开始。

我想，胡适的博士论文在西方的影响不大，但对中国人的影响不小，而那些中国人对西方的影响很大，包括冯友兰。所以，胡适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

关于西方人对胡适的影响怎么样，我要先问，胡适关于语言哲学思想是从西方哪个哲学家那里来的？我还没有发现。日本人的解释曾影响到严复、刘师培，可是这些人对正名的解释完全是从逻辑的角度，这跟胡适很不一样，具体是怎样我也不大清楚。

我们不知道汉代以前是不是还有别的资料没有被我们发现，可是我想，研究古代中国的思想可以走两条路，一是以现在的概念去看古代的思想，二是看古代概念的演变。如果走第二条路的话，就尽量不要用现在的概念去解释古代。

你提到“名”的各种意义，是的，不过汉代以后的人们都认为，这种种用法都是从孔子的那句话来的，我不这么认为。

葛兆光：

汉代以后，由于董仲舒做了这样的解释，其他方面的含义就不大重要了，所谓名家基本上就没有了，而名这一类的书就变成了评价人物的作品。但是到了胡适这一代受西方影响的人这里，有关语言的一面又被强调了出来。所以这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

学生：

您认为在胡适以前没有人把正名提到这么高的地位？在我的印象中，中国古代的政治里正名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想我们不一定只看经典的解释，也要关注学说在实际政治中的活的应用，比如“议礼”等等。与其说正名是被胡适强调出来的，还不如说胡适把正名的含义做了一个转变，从社会政治的含义转向了语言哲学的解释。

戴卡琳：

胡适想说服我们，正名是一个很系统的理论。但是我不知道，在胡适之前，有没有人把它看做是系统的理论。

学生：

对，中国古代的思想往往不是以系统的理论形式出现，而是体现在关于社会政治问题的具体讨论当中。我很同意您的看法，胡适把正名论述得很像一个体系，这也是我们现在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如何用现在的概念或者理论体系来处理古代零散的、因具体情境而发的思想。

戴卡琳：

如果它本来不是一个体系的话，我们不一定要把它体系化。

学生：

您说到两种研究的道路，我在考虑是不是一定就只有这两条道路呢？您说您在走后一条路，我在怀疑这后一条道路对于研究古代中国思想是不是合适？古代中国思想是不重视概念的，比如“名”和西方的“概念”有区别，“名”不是“概念”。我们应该使用古代式的“概念”来进行研究，而非现在这种非常清晰的“概念”。您没有提到名家，也没有关注《荀子》的《正名》篇，如果只研究“正名”这两个字，会不会忽略一些东西？

戴卡琳：

我描述第二条道路的时候，没有用“概念”这个词，因为我同意，不应该叫概念，而是那个时候所用的一些词。胡适把正名当作一个概念，我不是这样，我的研究就是要探明什么时候正名被当成了一个概念。

《荀子》所讲的与名家所讲的“名”都是一个抽象的东西。《正名》篇当然是很重要的，可是我的研究不是关于《正名》篇。而且我想，汉代以前也没有什么名家。诸子百家很多人讲名，可是讲的是不是和孔子与子路的对话有关？荀子写《正名》篇是不是要解释孔子的话？可能是，但是他没有说清楚。我研究的是，什么时候有人开始把这个说得很清楚。

徐洪兴：

戴卡琳教授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新的研究思路，观察的角度也很特殊。大体上我基本同意你的观点，不过还有一个问题，你在研究“正名”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反正名的问题？道家好像不在你的视野范围之内，老子在哪里？庄子在哪里？“名可名非常名”，“名”与“物”之间是什么关系？实际上先秦时期“名”和“物”是一个概念，包括庄子的“齐物”，他讲的也是“名”的问题，还有公孙龙的“指物论”。讲“名”的时候，完全脱离语言哲学的框架，全部回到历史当中也是不行的，因为名本身就是和言联系在一起的。首先还是要解决“名”是什么的问题，“正”只不过是一个动词。所以我觉得还可以进一步思考一下。

我还可以补充一点，正名到了汉代比较有系统一点，这大概和正统论有关系。汉代是要继三代之统的，秦代只是闰统。汉代为什么要尊经？并不是要崇儒，而是因为经典代表着正统，象征着三代。总体上这个报告很好，对我很有启发，谢谢。

戴卡琳：

谢谢这位哲学系的教授。我再重复一下，我的目的根本不是从哲学的

角度看当时的人对名的所有解释。很多的学者都做过这个题目，讨论也很多。老子、庄子都没有提到“正名”，他们只提到“名”，但我研究的题目是“正名”。我的研究跟你提到的“名可名非常名”、齐物论，包括刚才那位同学提到的《正名》篇，都没有关系。

你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汉代的正名与正统论有关，可能是的。但是我不知道汉代有没有从这个角度讨论过“正名”，而不是“名”的著作。

孙英刚：

我感觉，在先秦正名的讨论已经很多了。葛老师是从学术流派说的，实际上如果我们只从“正名”这个词的概念来讲，就有三种含义，一是正者政也，尊卑也，秩序也，名不正则言不顺；二是正者宜也，约定俗成谓之宜；三是正者一也，公平也。在不同的讨论环境里面，正名的含义是不一样的。我同意你的看法，在先秦正名这个词没有固定的用法，但是它在不同的系统里面是非常有逻辑的。至于汉代以后是不是“正者政也”的这个含义突显出来，其他两种就没有了，我不知道。

戴卡琳：

我查的不单是“正名”，也查了“正其名”，或者“名正”、“名不正”等等。你说的是不是有点矛盾？你说汉代以前有不同的用法，可是还是有一个系统？

孙英刚：

不是一个系统，我认为“正名”这个词在各个语言环境里面分别都是有系统的。

戴卡琳：

对，那个时候的正名还不是一回事，比如我提到的《管子》，五个地方提到了正名，含义却不一样。可是，到了胡适以后，西方人就认为正名从很早

就是一个意思，然后就被演绎到了不同的方向。这是当代人的解释。

葛兆光：

我把话题转回到学术史上来。我一直比较关心日本人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我没有完全的证据，不过我觉得有可能日本学者在明治、大正的时候，特别关心《墨子》中关于“名”、“实”这样的问题，而且因为受到西方哲学的影响，特别关注古代的名家，把这个提炼为比较抽象的语言哲学，而这些论文在胡适之前，20世纪初就经过了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的介绍，进入了中国。在胡适写出博士论文之前，这部分经过日本影响的中文论述，会不会成为胡适写名学史的资源？比如梁启超的《子墨子学说》这篇，很明显地就用到了日本人的论述。

戴卡琳：

我想胡适没有受到梁启超、章太炎的影响，梁启超承认，孔子的正名他一直不懂，直到看到胡适的解释才懂的。至于严复和刘师培，他们是受到了日本人的影响，不过他们是用逻辑的观点来解释正名，认为这是中国逻辑的出发点。这和胡适的区别比较大。

葛兆光：

我觉得你不一定只看他们对于正名这一句话的解释，也许他们在说别的事情——比如墨子——的时候，会启发胡适关于这句话的解释。

徐洪兴：

中国人不喜欢死抠概念。比如你说，孟子没有提到正名，但是孟子说过孔子为什么作《春秋》，而春秋笔法实际上就是正名的问题。

戴卡琳：

对，你说的这个没有人怀疑。可是我的问题是，孟广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头脑里是不是有孔子的正名这句话？后来的人都这么说，但是孟子并没有这么说。

徐洪兴：

中国有所谓“得意忘言”的说法，我觉得不一定非在字面上分得这么清楚。而且我也不相信到了司马迁，正名的概念就一下子翻转过来，这里面一定还有某种延续的东西，一些 missing link，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

戴卡琳：

我觉得也许我们要“得意忘意”，因为“意”都是我们自己的，我们不可能知道古人怎么想。

葛兆光：

如果一定要落实到文献的直接证据，那很可能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发现一个事情以前没有，后来突然有了。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一种思路，就是过去没有说出来，现在把它说出来了，就是所谓的“显题化”。在司马迁、董仲舒的时代，原来所包含的意思被他们明白地说出来了。

董少新：

今天的讨论很有意思，我们看到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在研究思路上的不同。您今天提到正名在后世内涵的变化，我们也可以问，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产生了这样的变化，可能会更加具有历史性。后人在解释经典的时候，总是标榜自己阐述了原意，但是历史学家应该揭示这些变化背后的历史因素。哲学家当然可以继续丰富这些思想，也不必再宣称自己发现了古人的原意。这是我听报告的一点启发。

戴卡琳：

我想不能说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有多么大的不同。当然我的研究非常有限，说不定未来我们会发现一些出土文献讲到正名，我所提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历史问题。我同意你和葛老师的看法，汉代的解释很有说服力，也许他们真的是懂孔子等人怎么想，真的懂《春秋》与正名的关系。可是这仍然只是一种解释。我今天的问题和那个解释没有关系，我只是想从历史的角度去研究“正名”这个说法什么时候变得比较重要，怎么解释，等等。

章清：

时间差不多了。我想大家一定跟我的想法很接近，这是一次很有意思的演讲，也是一次很有意思的对话。照我的理解，戴卡琳教授的报告是从西方研究中国的学术史中延伸出来的一个问题。她提到的西方关于中国思想的著作都赋予了“正名”以特别的意义，把“正名”作为中国思想史里面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她是要追踪这个问题是怎么发生的，然后讲到了胡适的看法。当然戴卡琳教授也已经讲到，这里头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在座的老师和同学们也提了很好的意见。

最后我有一个感觉，留给大家思考。我的感受是，戴卡琳教授的报告是从西方学术背景里面生发出来的一个问题，希望在中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但似乎今天在场的中国学者都在把问题往西方找，是不是胡适的想法来自西方。这会引发我们关于学术史研究更深入的思考。

再次感谢戴卡琳教授的精彩报告，感谢老师和同学们的热情参与，谢谢大家！